

# 中国

## 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研究

白玲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序

改革乃当今世界之潮流，也为人类历史发展之必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它起始于农村，进而推进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从宏观到微观，改革之广度，从记事顽童到鹤发老人都能说出一二。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也给中国百姓带来了实惠。党的十五大总结了二十年的改革经验，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中国改革已到了攻坚的关键时期，应该看到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依靠我们自己，以中外历史上的经验为参考，在实践中大胆地尝试，大胆地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子来。

改革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个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讲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已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今后我们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总结经验，形成新的认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使我们的事业

永远前进。

白玲同志在长期从事教学、科研与党务工作中，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向，广泛搜集资料，钩稽大量中外史料，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分析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经验，探求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因、发展和规律，精心写出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研究》一书。这是一部为国内外读者提供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书。

该书在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全书共十一章，前五章着重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六章则偏重阐述了对外开放，既有史，又有论，既分别论述，又紧扣改革中心，重点突出，说理有力。不仅从改革与开放的特点与规律中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因，也从公有制的改革与多种实现形式中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优势，进而从理论与实践上更加充实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同时，正视现实存在问题的严峻性，揭示其深层原因，从而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多层次的、较为全面的对策。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一读。

蔡捷

1998年6月

## 前 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针对以往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至今已经近20年了。

20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为第一阶段,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与此同时,城市改革重在给企业一些自主权,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给予优惠政策,并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1984年10月到1991年底为第二阶段,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要解决企业活力问题,并逐步放开价格。海南岛成为中国大陆第五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的厦门和泉州等地区也逐步放开,一个从南到北的开放前沿地带初步形成。从1992年初到1997年9月经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他提出了中国要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步子再大一些。指明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解除了人们头脑中的禁锢,从此将改革引向深入。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从而使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1997年9月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

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本战略。1998年3月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九届人大。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不仅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从而将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的逐步深化，使得大陆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其中，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快速发展给经济运行增添了活力。据统计，1992年到1996年，国有工业年平均增长6.1%，非国有工业年平均增长33.1%；国有工业资产总额和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分别由1991年的74.4%和56.2%下降到1996年的56.2%和28.5%，非国有工业的比重则分别由1991年的25.6%和43.8%上升到1996年43.8%和71.5%。<sup>①</sup>其次，市场范围和作用不断加强，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初步走向市场化。目前，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评析，全部体制转轨国家市场化指数平均为4.4，而中国则为5.5，远远超过一般市场化速度。按国家计委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总体市场化程度已近65%左右，而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化程度已达80%左右，90%—95%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sup>②</sup>再次，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互相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广泛展开。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境）、沿江（长江、珠江等）、沿主要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还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职能的逐步转换，特别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过去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行政性直接控制转向更多地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

正是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世界银行1996年5月30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年度图表册表明，

从1985年到1994年,中国大陆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9%,居泰国、韩国之后,与新加坡并列世界第3位。1995年,中国大陆人均GNP为54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0.2%。GDP(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亿元增长到1995年的57773亿元,17年增长了15倍。三次产业结构之比,已从1978年的28.4:48.6:23,发展为18:49:33。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据预测,2000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进出口定货累计总额将达到10000亿美元。中国大市场大有潜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几次周期起伏,中国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例如,曾一度出现的投资过热,金融混乱,物价上涨以及某些泡沫经济现象等至今使人心有余悸;国有企业相当多的无效投资和亏损仍在吞噬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失业下岗人员仍在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农业的基础也不够稳固,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此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也较突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些问题都影响着改革的实际成效。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框架。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提出首先要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这是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确定政府管理、调控经济的位置,该管的一定管好,不该管的决不干预,要确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以此建立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第二,企业改革仍然是重头戏。从明晰产权关系入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摒弃“放权让利”的老路。在坚持国有经济占主体的前提下,探索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江

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sup>④</sup>第三，要培育发展各种市场，打破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过去20年的改革主要是取消统制，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和现货市场。今后市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将转向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劳动、房地产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此外，发展期货市场也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上述三点是深化改革的核心。其中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到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把过去“财政包干制”改为国际通行的“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要把中国人民银行改革成为执行稳定货币和监督金融两大职能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把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发展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把原来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混在一起的四大专业银行改组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银行，使它们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围绕上述核心，配套进行一系列改革，如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和发展前景乐观。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正在逐步实现。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到1990年，GNP比198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温饱水平，这一步经过80年代改革和开放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二步是到2000年，GNP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步正在通过90年代深化改革来促成。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第二步经济发展

战略目标将同步实现。第三步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再花 30 年到 50 年的时间,初步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步要靠 21 世纪进一步完善新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来促成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到 2050 年基本实现。可见,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同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紧密相联。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大陆经济,充满着希望和机遇,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不断推动向前。

该书共设十一章,前五章侧重于经济改革,着重对“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经济改革推进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建设”,“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等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后六章侧重于对外开放,着重对“对外经济开放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商品贸易领域”、“技术领域”、“服务领域”、“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及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作了总结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以各个阶段的国家政策为依据,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辅之规范分析,总结经验,揭示特点,探索规律及发展趋势,力求为国内外学者和实业界人士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到中国创建事业提供有意义的帮助与参考。

注: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1997 年 8 月 12 日。

②《光明日报》,1997 年 8 月 25 日。

③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目 录

序

前言

<b>第一章 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b> .....	( 1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兴起 .....	( 1 )
二、农村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 .....	( 22 )
三、农村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	( 44 )
<b>第二章 经济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b> .....	( 52 )
一、城市经济改革的进程 .....	( 52 )
二、城市所有制结构改革 .....	( 72 )
<b>第三章 微观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b> .....	( 78 )
一、对国有企业的总体评价 .....	( 78 )
二、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及改革途径选择 .....	( 86 )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对策 .....	( 94 )
<b>第四章 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b> .....	( 98 )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 98 )
二、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 .....	( 103 )
三、发展市场经济和市场体系 .....	( 115 )
<b>第五章 宏观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b> .....	( 121 )
一、转型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现状 .....	( 121 )
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经济职能 .....	( 126 )
三、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对策 .....	( 132 )
<b>第六章 对外经济开放的决策</b> .....	( 140 )
一、对外经济开放决策的进程 .....	( 140 )

二、对外经济开放决策的依据·····	(144)
三、对外经济开放决策的实施·····	(148)
<b>第七章 商品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b>	<b>(163)</b>
一、商品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进程·····	(163)
二、商品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成效与趋势·····	(171)
三、中国与世贸组织 (WTO) ·····	(176)
<b>第八章 技术领域的对外开放·····</b>	<b>(183)</b>
一、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发展与现状·····	(183)
二、中国大陆的知识产权保护·····	(197)
三、技术领域扩大开放的趋势与对策·····	(204)
<b>第九章 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b>	<b>(207)</b>
一、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发展与现状·····	(207)
二、服务贸易的法律建设和对外承诺·····	(215)
三、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趋势·····	(220)
<b>第十章 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b>	<b>(228)</b>
一、投资领域对外开放的发展与现状·····	(228)
二、鼓励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	(236)
三、投资领域扩大开放的对策·····	(250)
<b>第十一章 中国大陆与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关系·····</b>	<b>(256)</b>
一、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256)
附件：中美贸易平衡白皮书·····	(261)
二、中国大陆与日本的经贸关系·····	(274)
三、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经贸关系·····	(280)
<b>后 记 ·····</b>	<b>(288)</b>

# 第一章 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对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反作用力，改革困难重重。如何冲破阻力和困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选准突破口，推进改革，是各国改革遇到的难题。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采取了不拘泥于教条，一切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之路。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兴起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农村先后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公社化”运动。在合作化运动的初期，由于采取了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方针和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工作慎重，步伐稳健，合作化的发展稳定而健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52年农业总产值为484亿元，1957年已达到587亿元，每年平均增长5%。但这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过快地推进农业合作化和“合作社”进程，使得合作化初期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遭到极大破坏，造成了生产无制度、劳动无定额、报酬无差别的状况，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改革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但是改革如何进行，采用什么方式，缺乏经验，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我们纵览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时会发现，种种改革措施往

往是发端于民间，由于其效果符合中国农村改革的目标，然后才被认可和推广，并不断走向完善和发展。

### （一）改革从经营管理体制入手（1978年—1984年）

#### 1. 改革的主要内容

##### （1）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4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通过改革原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方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多劳多得的机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正如前言，农村改革由于其本身性质使其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要不要改革，改革中能不能包产到户等问题上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认识，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从整体上说是支持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对包产到户持谨慎态度。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得到体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但又十分明确地提出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4月3日，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虽然指出，在坚持生产队统一的前提下，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办法应当按照本地的具体情况、条件，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不要强求划一，但又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区别，是一种倒退”，并指出，必须注意保持人民公社体制的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认为基础的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中国农村现状的。这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确立以在农村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方向。但与此同时，农村中的一些实践却从事实上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改革之路。1978年安徽遇到了百年少有的旱灾，大部分地区连续十个月未降雨，水库干

涸、河水断流、秋种无法进行。当时的安徽省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集体不能种的地可以借给农民个人种麦、种油菜，谁种谁所有，国家不收公粮，不承担统购任务。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下，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首先带头搞包产到户，并很快扩展。当年全山南区1006个生产队有71.3%的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还有18.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第二年麦子总产量达2010万斤，大旱之年反而取得了历史最高产量，增产1435万斤，增产幅度为25%。滁县地区凤阳县进一步将包产到户加以全面推广并典型化为大包干，由此逐渐传播到全省。到1979年，全省实行包产(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部生产队的10%。其它形式的承包制所占的比重如下：包产到组的占22.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其它形式责任制的占11.3%(以上几项为实行联产承包的，合计为61.1%)；实行不联产承包的占38.4%；没有建立责任承包制的仅占0.5%。

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改革实践，促使党内外人士开始转变态度。197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系统总结了2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这句话虽然对包产到户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毕竟是一个突破。包产到户的口子开的虽小，但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1980年中共中央又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农村改革的问题。会后，向全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纪要充分肯定了联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政策，指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指出“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中，违背当地群众愿望强行推行一种形式，禁止其他形式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对包产到户的范围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

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纪要中，允许包产到户的范围比以前大得多，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有了松动，包产到户便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发展。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包产到户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一方面派出大批调查组到农村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一方面观察形势的发展，让实践来检验真理。实践充分证明，包产到户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此期间，包产到户更是迅猛发展。1980年秋，全国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占20%。这一年虽然气候极不正常，但与1979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产值仍比1979年增加了1.4%，除粮食减产5%左右外，许多经济作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棉花增长19.7%，油料增长11.4%，糖料增长12%，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1977年为117元，1980年上升到约170元。这些事实使得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1982年中共中央在一号文件中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巨大威力，并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书记座谈会。座谈会指出，在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看来今后还要发展。它将从局部地区发展到几乎所有先进地区，不要再堵了。从此以后，中共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到全国各地农村视察，反复宣传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原来一些处在观望的地方也搞了起来。1981年底，全国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上升到50%左右，1982年更上升至78.2%。与此同时，依照可比价格计算，农业产值的环比增长速度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为6.5%和11.3%。据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统计，1981年农民集体分配收入继续增长，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已达103.72元，人均300元以上的大队已达10943个，占全国生产大队总数的1.52%。人均分配收入300元以上的富县，在全国已达49个，占全国总县数的2%。1981年社员

集体分配收入比 1977 年的人均 65.5 元增加了 38.22 元。三中全会以后的 4 年增长幅度,相当于 1957 年至 1977 年 20 年增长幅度的 1.2 倍。集体分配收入人均 300 元以上的大队比 1980 年增加 96.5%。在这些事实激励下,1983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 1 号文件,全面彻底地充分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这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从此,包产到户席卷了中国农村,这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83 年中国农村又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产值的环比增长速度达到 7.7%,共产粮食 7600 亿斤,棉花 9000 万担。“六五”计划中规定的 1985 年农业总产值 2660 亿元的指标 1983 年已经达到。由于农业全面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战胜自然灾害,连续五年获得粮棉大丰收。全国已有 441 个县售粮超亿斤。1983 年,全国有 8 个地区(市)和 112 个县的农业总产值或粮食总产量比 1978 年翻了一番,比 1982 年增加了 3 个地区和 63 个县。其中有一个地区和 15 个县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实现双翻番。198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 1 号文件。《通知》指出,1984 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到这一年冬天为止,全国 569 万个生产队,有 563.6 万个实行了包干到户,全国的 18792.5 万农户,有 18145.5 万户实行了包干到户,分别占全国的 99.1%和 96.6%。据国家统计局《关于 198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载:

1984年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全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农业总产值为3612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大大超过计划规定增长4%的速度。扣除村（队）办工业，农业总产值为3062亿元，比1983年增长9.9%；林业为151亿元，增长15.8%；牧业为543亿元，增长11.7%；渔业为77亿元，增长13.2%；副业为700亿元，增长36.8%。

## （2）调整工农产品比价体系

这一阶段进行的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调整不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体系。主要措施就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售卖价格，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并且，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1979年和1980年降低了10%—15%，这样就从两个方面同时调整了工农产品交换的比价。农民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中直接得到了相当多的收益。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5年农民在价格的提高中增加收入2428.7亿元，每个农民平均增加收入290元。在这同一个时期，农村中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也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增加支出达1213.7亿元，平均每个农民比以前多支出146元，两者相抵，平均每个农民实际增加收入144元。

## 2. 改革的主要成效

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改革，农村在这几年间发生了若干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业生产扭转了长期停滞徘徊的局面。1952年到1978年间，农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4%，粮食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2.4%，油料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0.8%，肉类产出的年均增长



率为 3.6%。而在改革的这一个阶段里,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若扣除价格因素,1978 年到 1984 年间,农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达 9.5%,1978 年粮食总产量 30477 万吨,到 1984 年达到 40730 万吨,增加 10253 万吨,年平均增长 1708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4.95%。粮食连续六年这样大幅度的增产,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棉花 1978 年只有 216.7 万吨,1984 年达到 625.8 万吨,增加 490 万吨,年均增长 68.18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19.33%,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984 年,中国粮棉绝对产量都为世界第一,粮棉在 1949 年以来第一次由进口变为出口。除粮、棉外,油料、糖也都大幅度增产。

(2)扭转了单一的产业结构,由只抓粮食向农林牧副渔和农工商综合经营转变。1978 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67.2%,而到了 1983 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降到 62.1%,林牧副渔各业比重上升到 37.9%。

(3)农村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1983 年粮食商品率由 1978 年的 20%左右提高到了 30%以上,农副产品的商品率由 1978 年的 49%提高到了 55%。

(4)农业生产由低效益向高效益发展。1983 年,农村人均劳力创造 893 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30.6%,平均年增长 5.5%,大大超过 1978 年以前年均增长 1.29%的速度。

## (二)改革进入流通领域(1985 年—1989 年)

1985 年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农村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取消统购派购,使农民逐渐转变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 1. 改革的主要内容

农业连续六年的丰产增收,不但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许多地区已有节余,积累了大量农副产品。但是,由于城市经济体